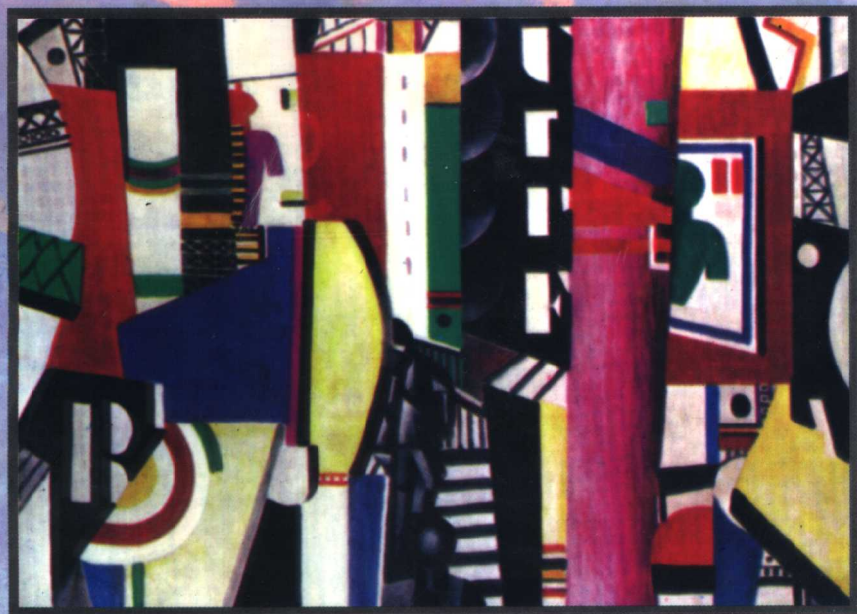




世纪艺术文库·史述编

张 韧 著

新时期文学现象



文化艺术出版社



世纪艺术文库·史述编

张 韧 著

新时期文学现象

文化艺术出版社

新时期文学现象

张 韧 著

*

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丰台区万泉寺甲1号)

新华书店 经销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25 字数 205,000

1998年2月北京第1版 1998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7—5039—1707—5/1·740

定价:16.80 元



著名评论家张韧同志，
本名张家钧，1964年北京大学
毕业即到中国社科院文学
研究所从事当代文学与理论
批评工作，研究员。主要著
作有：《中篇小说论集》、
《小说世界探索录》、《文
学的潮汐》、《张韧文学评
论集》等6部，主编与合编
《百年百部争议小说精选》、
《中外中篇小说名作选》等
26卷本。

《新时期文学现象》作
者从独特的视角，在中西文
化的纵与横的交叉点上，透
视了色彩斑斓的诸种文学现
象、呈现出新时期文学历史
的特有风貌。从文学现象审
视史的变迁，在学术领域还
是一个新命题。本书语言畅
达，理性的沉思与艺术情感
相交融，读来轻松而又耐人
思考。

目 录

中国当代文学与世界	(1)
新时期反思文学的浪潮	(37)
新时期文学与哲学结盟之现象	(54)
八十年代中期的“文化热”	(76)
一 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文化热”背景	(77)
二 寻找文学之“根”与追求精神的皈依	(82)
三 勘探生存本相的“新写实”现象	(101)
四 迷惘与重构——都市浪子文学	(123)
纪实文学现象的兴起	(145)
一 报告文学的轰动与小说的沉寂	(145)
二 报告文学的现状及其走势	(153)
三 纪实小说的美学形态	(165)
九十年代文学的六大模式	(180)
一 文学旗帜的演化	(182)
二 文学审美信念的嬗变	(184)

三 文学回视历史的变焦·····	(185)
四 文学的关注点·····	(188)
五 文学扫描热点·····	(189)
六 文学价值的震荡·····	(191)
小说新思维及其变迁 ·····	(195)
文学的新思维与新格局 ·····	(210)
环境文学：绿色家园的失落与重建 ·····	(218)
文化环境的异质比较与文学创作 ·····	(228)
走出地平线的新经济小说 ·····	(237)
突围与误区：一九九四年“新”字号	
诸家小说现象 ·····	(243)
九六现实主义小说现象的回思 ·····	(254)
人文精神、新启蒙与文学 ·····	(261)
写在书后的话·····	(284)

中国当代文学与世界

—

如何认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是一个古老的但又是面对二十一世纪的未来学极为关注的文学话题。早从文艺复兴时已出现了文学的环球主义意识，学术眼光不再囿于一个国度一个地域，开始了对世界文学圈子的逡巡。歌德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但对于一国与世界文学的关系，我更欣赏海恩利希·哈特和朱利斯·哈特一八七八年在他们主办的《德文月刊》上的申明：“尽管我们的刊物主要讨论德国文学，但我们不会忘记，每一种文学都是世界文学之树上的一枝。”我们既反对欧洲或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又不同意东方文化自我中心主义。本文在回眸中国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乃至文化的关系时，不打算从媒介学式地研究文学影响的具体途径，如翻译、评论、介绍、人员交流等，也不是渊源学式地研究文学作品的主题、人物、风格、情节等的来源；更不是文类学或文学史式地研究外国的文体、文学流

派或文学运动是如何在我国流传的。阐述我们当代文学与他国文学关系,不是比较孰优孰劣孰高孰低,简单地说,本文希望探求的是,我们当代文学进程中主要接受了哪些外来影响,这些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在促进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学发展与昌盛方面,与世界文学应建立怎样的关系,它是否有什么规律可寻?

中国接受外来文学和文化影响走过一个“之”字形的道路。汉唐盛世曾主动输入印度佛教文化及其别国的文学,丰富了祖国的文学文化宝库。但随着封建帝国的衰败、没落,而长期实行了闭关锁国的政策。中国近代也不是主动门户开放的,而是被列强的枪炮轰开了大门。“洋务运动”的破产与“戊戌变法”的失败,中国知识分子视线由注重上层和皇帝的政治变革,转向下层与改革国民之灵魂,注意吸取世界的进步思想文化,尤其将文学作为变革精神的先锋。历史一再证明,现代与当代进程出现的文学思潮、流派以至提出的文学主张和口号,往往与外来影响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且不提世界进步思潮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深刻影响,也不说陈独秀接受欧洲尤其俄苏思想影响而倡导“文学革命”,即使在此之前,梁启超举起“小说界革命”的旗号也不能说是没有外来的影响。早在一八九八年他就说过:“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1]因此他得出结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倘若读一读他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你就会理解梁启超是怎样借鉴外国又是怎样实践他的小说革命的宣言的。那么,小说革命、文学革命旗号下的创作又是怎样呢?小说一千多年历史不同于传统的诗与散文,既没有像建安七子、竹林七贤那样的群体,又无桐城派、竟陵派、公安派那样地域性的

流派现象。但到了“五四”时期在世界进步文学思潮冲击下，中国小说终于结束了“名不列于四部，言不齿于缙绅”的卑贱命运和无流派的历史。面对潮水般输入的从西方文艺复兴到近现代、从欧美到俄日的时空纵横的文学影响，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未名社、沉钟社等带有流派特色的文学社团也就纷然崛起了。其中“为人生”派，接受俄罗斯、东欧北欧诸国关注社会问题的文学精神，创造社则主要受英法德等西欧浪漫主义以及唯美感伤的情致影响。还要列举更多的例证吗，不用了，历史已经示明，当我们回首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学进程，绝对不能轻忽了世界文学和文化的引进及其影响。正如茅盾所言：“我们现在所讲的什么新文艺，根芽完全来自异域的。”如果疏离了这一视野，单一研究当代文学的历史现象，必将陷入孤立、狭隘的境地。

二

当代中国文学的起点，人们习惯于说是开国礼炮揭开了它的第一面。但它的开端实际要早，即一九四九年七月二日开幕的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因为，正是这个来自国统区和解放区两路大军在北京会师，为迎接“中国人民新的纪元”而召开的首届全国文代会，“有了文艺界的广泛的团结，又有了文艺工作的正确的方向”^[2]。这“一个新的光辉的阶段”，它既是由“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的现代文学历史的终结，又是中国当代文学又光辉又坎坷的历史道路的发端。

当代中国文学尤其十七年究竟接受了哪些外来影响？论著通常认为来自苏联或者说是俄苏文学，对于世界特别是西方文学文

化则采取封闭方针。从当时政治历史背景说，因为“一边倒”的国策，使苏联文学影响占据了主导地位。然而，如果因此而得出封闭别国的结论，也是不大符合历史事实的。我在翻阅新中国对外文化、文学交流纪事以及十七年出版的影响较大的报刊和重要理论著作时，发现它所涉及的国别与作家名单范围颇广，仅仅西方近现代作家就三十多位，但丁、塞万提斯、易卜生、歌德、海涅、拜伦、狄更斯、司汤达、巴尔扎克、雨果、罗曼·罗兰、惠特曼、德莱塞、马克·吐温、杰克·伦敦、茨威格、阿尔贝蒂，等等，倘若加上俄罗斯的、苏联的、当时社会主义阵营以及亚非拉诸国的作家，其名单是那么长长的，世界知名作家几乎应有尽有。可见，十七年的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关系，说它是封闭的，排斥或拒绝世界文学，显然是不公正的。毛泽东的洋为中用方针，促使中国与世界文学交流的大门并没有完全关闭。上面提到的那些作家及其作品，尽管当时的介绍、评论和研究文章有的不算客观、全面和公允，但确实将他们作为名家名作介绍给中国读者了。

值得思索的一个现象是，对我们当代文学影响重大的为什么不是西方而是俄苏文学呢？那些世界级的名家名作，其中不少曾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而在当代文学进程中他们的声音为什么变得轻淡了？政治原因当然是重要的，但一切归结于此，又显得简单。事实上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我们不妨从接受美学原理探讨一下它的原因。德国学者 H·R·姚斯在《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中提出的接受美学，既有缺陷又有价值。他谈的虽然是文学作品与读者个体接受的关系，但它将读者由被动接受提升为主动接受的地位，提出的读者期待心理视野与作品的“视野相融合”原则，对于探讨外来文学对于一

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学影响，同样是有启示的。也就是说，对别国文学的接受，不是纯粹被动的而往往是需要性的接受；对外来文学的解读与阐释，与需要性有着密切关系。譬如说挪威的易卜生，《新青年》早在一九一八年便出版过“易卜生专号”，新文学运动中的“为人生”派及其他一些写实主义作家，将他的创作与“社会问题文学”自动联系起来。鲁迅说他的小说不过是“提出一些问题而已”，冰心、庐隐、王统照、许地山等都写“问题小说”。正如茅盾所言：“文学中讨论到社会上种种问题，实是易卜生开始。”^{〔3〕}当时文坛上的“易卜生主义”，真是大为风行。应该说，十七年文坛对易卜生并无排斥的意思，而且做过认真介绍。可是，当时自感生活于灿烂阳光下的作家，并不像“五四”时期那样热衷于易卜生的“社会问题文学”。易卜生自身文学价值并没有改变，但他在中国现当代历史上的影响却发生了一长一消的变化。

易卜生是西方文学在中国现当代历史变迁的一个例证。那么在东方、特别是被崇奉的俄苏文学名家，对中国当代文学影响地位是不是稳固而不变呢？就以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吧，新文学运动中的《小说月报》在其“俄国文学专号”介绍“俄国文学四大家”时，陀氏与果戈里、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并列。二十年代开始译介他的作品渐多，《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有两种版本，三种版本的有《罪与罚》、《穷人》、《地下室手记》，而《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竟然有四种版本。郁达夫受陀氏影响之大无须多谈，茅盾除了对他发表评论，连小说《虹》与《蚀》亦可窥见陀氏的印痕。当代文学评介陀氏并不冷淡，一九五六年纪念世界十大文化名人，陀氏大名列居其中，《人民日报》七月十七日还隆重发表了戈宝权的《伟大的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然而，由于当时的

作家对陀氏小说艺术，一时间还不大理解，或多少存在着隔膜，在十七年文学中陀氏几乎谈不到发生多大影响，根本无法与现代文学历史相比拟。颇有意思的是，当八十年代中国文坛兴起现代主义文学热的时候，陀氏重新被推了出来，而且推出的是那样的热烈。西方人士早有预感地说，在托尔斯泰的大山背后，陀氏将崛起。^[4]五十年代中国文学界没有谁预言过，但陀氏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复活”了。陀氏小说那种非理性，变态心理，对人性、人格分裂的探掘和多声部的现代叙述方式等，中国读者和作家在五十、六十年代不能理解，但经历十年浩劫而到了八十、九十年代吸收西方现代派与后现代派的同时，被重新认识的陀氏小说也就受到热情的接纳，甚至连巴赫金评论陀氏的复调小说理论著作也博得了赞赏。

当然不止是易卜生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东方与西方作家还有一些类似的命运。所以说，当代中国文学对外来影响接受什么，拒绝什么，由热变冷，由冷而热，它是一个很复杂的现象。政治制约是主要的，但不能将一切现象全都归咎于极左政治。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的民族文化心理和时代情绪，需要选择与欣赏趣味，诸种因素无不影响亲和什么与疏离什么。正是这种多层次的因素，影响着俄苏与西方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坛的变迁。不作具体分析，简单地地下结论，无助于认识外国文学在中国发生了哪些影响，也无法理解当代文学为什么会这样而没有选择另一种运行的轨迹。

三

我们接受世界文学影响的历史，大体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

从别国撷取一个或几个作家作品；一是对别国和民族的文学接受，带有总体性的特点，其着眼点不仅仅是吸取某一具体作家作品或具体艺术技巧，而是注重这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学共同性特征。前者如我们对法国的巴尔扎克、印度的泰戈尔等，而对俄苏文学，则属于后一种类型。我们作家究竟愿意选择俄苏哪一位作家或哪一部作品，那是因人而异的，但是关注俄苏文学的总体性始于现代文学，到了当代文学它就更加突出了。如俄罗斯的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里和托尔斯泰，风格各自有别，然而中国文学家不仅仅从托翁《艺术论》提出的原则，而且从他们整体吸收了“为人生”的文学观。不仅仅从这些大作家还从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大批评论家那里，加之一起地接受了现实主义、创造典型、正视现实、暴露黑暗的“为人生”的文学精神。

至于说我们接受俄苏文学为什么不是个别或部分的，而是总体性的，这显然与民族历史背景的共同性有着密切的关系。众所周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其实在那炮声之前之后也送来了俄苏文学。当时正处于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中的寻找进步思想文化养料的中国人，面对与民族历史文化背影相近的俄苏文学，自然引起共鸣与热烈回响，因而从总体上接受俄苏文学，那是顺理成章的。无论是对于正在进行伟大革命斗争的中国人民的鼓舞作用，还是对中国文学的“榜样”力量，无不发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当代中国文学与苏联文学关系，依然承续了现代文学历史那种总体性的特征，而且由于国家政权力量的支持，使苏联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如同潮水一样的涌入中国。不但给作家们提供了创作方法、文学思维及叙事方式，而且影响了共和国

一代人所形成的关心集体、无私奉献的人生价值观。

新中国的十七年文学所接受的苏联文学总体性影响，在我看来不仅仅在创作方面，而是多层次的，如文学的领导方式与文学的指导思想，文学的思潮，文学的创作方法，技法及艺术形式等。应该说，现代文学接受俄苏文学也有不足和缺陷，但主导是积极的。进入当代文学历程尤其十七年阶段，接受俄苏文学特别是苏联文学多层次的影响，却呈现积极与消极的瑕瑜互见的形态，尤其极左思想控制文学界的时候，那些消极面也就变本加厉了。

先谈苏联文学的领导方式与指导思想的影响。本文原想不涉及这一非文学的问题，可是苏联文学的领导方式与指导思想，与我们十七年文学的命运又是息息相关的。如果回避它，当代文学许多历史现象就会变得莫名其妙或模糊不清了。新中国文学发端前后，苏联文学界正在发生重大的事件，这就是一九四六年联共（布）中央关于两个文学杂志（《星》和《列宁格勒》）、一部电影（《灿烂的生活》）及其剧场上演节目，连续作了三个决议；一九四八年二月又作了关于歌剧《伟大的友谊》的决议，以及执掌苏联文学领导权的联共（布）中央负责人日丹诺夫所作的《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报告》。这一连串的决议文件和报告，不但及时译介到中国来了，而且还被当作文学的指导性文件，以至一九五一年末文艺界整风还将它们列为必读和基本学习文件。这些决议文件和报告对待文艺问题，采取的不是自由讨论而是由上而下作出政治性的决定，它直接影响了中国对于文学问题的领导方式。不过在中国，往往采取领导者个人或“讲话”，或“批示”，或发“社论”及“编者按语”等方式，传递了自上而下

的对文学问题作出的重大决议或决定。

苏联文学的指导思想理论，特别强调文学服务政治或从属于政治，而且将文学服务的这一政治含义无限延伸，将文学问题当作阶级斗争和争夺领导权的问题，把政治扩大为政策，以及将文学为政治服务与为政策服务等同起来。在两个杂志的“决议”之前，早于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八日俄共（布）中央《关于党在文艺方面的政策》的决议说：“正如一般阶级斗争在我国没有停止一样，阶级斗争在文学战线上也没有停止。在阶级社会中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中立的艺术。”又说：“无产阶级应当保持、巩固、日益扩大自己的领导，同时要在思想战线许多新的区域中也占有适当的阵地。”^[5]这份“决议”所表述的观点，包括它的词语和表述方式，中国读者会有一种仿佛见过面的感觉，对它太熟悉了。日丹诺夫关于两杂志的“报告”，其实是将文学问题导引为政治问题、阶级斗争与争夺领导权斗争问题的具体化。^[6]苏联文学的自上而下的领导方式与文学为政治服务并引向了为政策服务的指导思想理论，对我们当代文学影响之广、负面效应之大，至今没有得到深入的清理。例如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有的报告尽管对文学与政治、政策关系力求作出理论化的阐释，但强调文艺工作者必须“学习各种基本政策”，“不懂得城市政策、农村政策，便无法正确地表现城乡人民的生活和斗争。”^[7]这种强调文学为政治为政策服务的思想，它是来自哪里的影响已经无须注明了。

建国伊始，对《武训传》展开了自上而下的政治批判运动，紧接着对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也开始了。值得注意的是，批判《武训传》远远不止是一部影片的问题，它波及以至震动了整个文艺界和思想文化领域。《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也沿续

了《武训传》批判之风，各地不少报刊也先后提出篇目展开“倾向化”的批判。耐人寻味的是，批判正在紧张进行的一九五一年八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斯大林给杰米扬·别德内依同志的信》。别德内依是苏联诗人，列宁曾对高尔基说过，他的诗有巨大鼓动意义。我查阅到斯大林给别德内依的两封信，一封是一九二四年写的，劝他“到巴库玩玩”，态度热情。另一封即是《人民日报》载出的，写于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二日。如果按一九五一年中国发表时间来计算，这封写于二十年前的信突然拿出来发表，其意何在呢？发表此信时编者加了一个按语：“这封信中提出了两个重要原则性的问题，即文艺作品如何表现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精神及党的作家如何对待自己的错误。”信文有这样一段话，“而你呢，不去了解革命历史中这个最伟大的过程，不把自己提高到能够担负起先进无产阶级歌手的任务……而是对我国人民的诽谤，是对苏联的侮辱。”除了披载了给别德内依的信，北京几家重要报刊还先后发表了苏联文艺界正在进行的批判乌克兰一位诗人和一个歌剧的《真理报》“专论”及其它文章。当你读罢给别德内依的信和这些批判文章，如果再回过头来看一看《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及对《我们夫妇之间》等作品的批判文章，你将不难发现，包括思维方式与理论话语在内，它们之间多方面的联系是十分明显的。

应该说，有着“五四”新文学运动革命传统的当代中国作家，他们是张开双臂迎接共和国诞生的，满腔热诚的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在曲折的十七年期间创作了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报告、电影、戏剧等各种样式的多样艺术风格的优秀作品，赢得了中国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那么众多的热情读者，文学与人民发生

了广泛的联系。我们当代文学也跟人民一起走过坎坷多灾的道路，它是由社会总体形势决定的。但作为文学，又有着其它领域所没有的遭遇。新中国初年，由《武训传》批判开头，接着的是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及胡适文学思想批判，胡风文艺思想批判运动，如果加之以对作品的大大小小的批判，这种不间断的批判运动使文学很难得到休养生息、再创佳品的机会。我们并不是说这些作家作品完美无瑕、不可批评，问题在于这种批评完全屏弃了依靠讨论与争鸣来分辨是非的文学规律，将文学与政治问题相混淆，纳入阶级斗争与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自上而下地发动了狂风暴雨式的政治批判运动。当我们回思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历史教训时，不能不看到包括指导思想与领导方式在内的苏联模式，给我们当代文学带来的影响是何等的沉重而又沉痛。

四

从思潮影响方面说，发生于五十到六十年代的苏联“解冻”文学思潮，对五十年代中期的当代文学的影响是明显的。一九八四年召开的第四次中国作家代表大会上，代表激动地欢呼“文学春天”的到来。其实从历史说，中国当代文学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上半年曾有一个春天，虽然那是一个短暂的早春天气。当时，毛泽东于一九五六年五月二日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正式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全国知识界引起了热烈反响。文艺界人士在座谈会发言和发表文章中，把双百方针比如“春风”，深有“如沾化雨，如坐春风”之感。对于当时出现“春色满园”的这一生机盎然的景观，有些论著提到了苏联文学的影